

# 重构中美安全关系\*

[美]莱尔·J. 戈尔茨坦 彭萍萍 编译

近期在中国领海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一些人宣称“新冷战”降临东亚。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承担更大责任的论调进一步高涨。在不断质疑中国国内政治运作和持续批评北京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现在反华情绪在华盛顿已经达到了狂热状态。尽管为了防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常常必须依靠武装力量,但一种新的“强硬”的方法实际上并不必要。

总体而言,中国的崛起保持着和平的进程,在30多年时间里它都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对抗另一个国家。它向诸如黎巴嫩、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热点地区派驻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其舰队在亚丁湾打击海盗行动所做的一样。当处理与其周边偶尔不稳定的弱国关系时,如吉尔吉斯斯坦或塔吉克斯坦,北京没有诉诸武力干涉,甚至也没有展示其军事力量以获得优势。中国的海事服务,不管是在南中国海还是东中国海,一般都由非武装的巡逻快艇执行,这都是中国不想让这些问题升级为重大危机的一个明显信号。与“中国的高级军官都是顽固的老鹰”这一观念相反,一名有影响的中国海军上将最近在一次采访中总结边界谈判的经验时指出:“如果永不让步或妥协,在边界谈判中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突破”。

不可否认,北京在军事技术的关键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其海军建设项目还是温和的,并不激进。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不会拥有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航空母舰部队,它采取了一种慎重而相对从容的方法发展其水面舰艇部队和两栖攻击舰队。重要的是,中国仍然离使用强大的核潜艇部队相距甚远。相反,其主要关注点还在于建设更倾向于执行中国沿海防御行动的常规潜艇而不是在蓝色水域上进行军力投射任务。当然,最近第5代歼20战斗机和许多其他先进系统的推出,证明中国有相当的能力发展先进武器。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并

不令人震惊,中国建设与其新地位相匹配的武装部队的决定同样如此。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已经久处现代的中国是如此软弱——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迅速发展将自然地导致担忧,尤其是其近邻的担忧。但是美国不必过分担心,而应保持谨慎和宽松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以避免陷入与更大范围内的权力平衡和全球秩序无关的地方冲突。华盛顿在本地区的盟国,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拥有有能力的海军,并正采取措施以使他们更为强大。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同样不愿屈服于来自北京的命令。如果中国外交官不能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印度作为其竞争者将崭露头角,横跨在中国通往中东的关键航线上。即使一个严谨的现实主义者也必须承认中国正在亚洲这一片存在顽固且多疑的竞争对手的丛林中崛起,国际体系中的自然平衡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限制中国的野心,因此北京一直担心其形象(最近以“和平发展”代替了“和平崛起”)。另外,必须对威胁的意图和能力进行评价,才能获得对威胁的全面认识。不可否认,评论家对最近几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明显缓和这一好消息重视不够,而这长期以来曾被认为是全球安全中最为危险的热点问题。

总而言之,华盛顿在亚太地区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不必过分担心中国的崛起,免得美国的焦虑使世界突然陷入许多人担心的冷战之中。当前流行的那种强硬遏制措施,比如增进与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的防务协议,将是轻率的。如果认为意识形态的狂热能够与地区小国的请求相结合,从而使美国做出超越其真正的国家利益和能力的事情,那么就会出现“格鲁吉亚景象”的风险。

与积极的遏制战略相反,华盛顿应该寻求对北京采取更为有效的参与战略。它应该关注的不是货币争端或者人权问题,而应是这样一个原则,

\* 原文载于《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1年第2期。作者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主任。

即中美必须努力走向安全合作这一关乎 21 世纪及以后和平的关键基础。这并不容易做到,而是需要耐心、灵活,也许首要的是太平洋两岸领导人的重视。

有些步骤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当务之急是为已经建立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增加强力的军事成分。合作不能仅仅建立在正式的协议或高层的个人关系上。相反,在各个层次中都需要一种实际上把军事合作制度化的系统的方法,尤其是在下级军官和职员层次中。特别是在海洋领域,应该在六大重要方面推进合作:信任建立与危机管理、搜救、救灾、环境管理、区域海事安全、海上通道安全。中美安全关系中的海洋因素非常重要,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它是造成总体安全关系相当紧张的原因所在。中美不能仅仅按照自己的取向发展,这必将导致军事竞争的加剧。相反,认识到竞争加剧将导致的危险,双方就必须开展创造性的新的外交,以克服棘手的路障,并通过奠定军事合作系统方法的基础,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 信任建立和危机管理

最近几年来引发严重海军危机的事件,凸显了中美关系中信任建立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2006 年和 2009 年中国海军潜艇和美国水面舰艇的两次密切接触,以及 2009 年 3 月的“无瑕号”事件。这一事件成为继 2001 年 4 月 EP-3 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相撞以来最为危险的事件。

信任建立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发展对于奠定巩固的安全合作基础是很关键的。这样的机制应该包括高级领导人之间、军事机构之间定期对敏感问题进行的沟通。华盛顿和北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国国防部之间热线的建立。中美防务磋商会谈和军事海运协议也是这方面成就的代表。然而,这些对于预防海上的紧张局势和大量的事件是不够的。

如果要提高彼此的信任度,职员和高级行政人员之间的军事交流确实需要更为深入且广泛。有选择性的港口访问和简单的共同演习限制了当前海军间的接触,这种有限的接触对于完成任务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华盛顿和北京应该考虑在军事科研机构、战争学校及类似机构之间建立学术和教育交流。未来的发展应该包括演习的预先

通知和观察、设备访问和双边的战略对话。培养合作关系的努力必须反映现任领导人的信念,即再也没有比中美双边关系更为重要的事了。

认为中国从这样的交流中学到太多的东西,使美国一些决策者头脑中的禁忌得到加强,但是这些评价低估了北京对美国军事的了解程度。随便对中国的网站或军事杂志进行浏览,就能得出结论,中国对于美国军事行动极为了解,而这并不是军事交流所促进的,仅仅是美国社会开放、透明的副产品。相反,美国军方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实际上是美国方面从军事交流中了解更多。

另外,双方领导人对诸如 2001 年的 EP-3 侦察机和 2009 年的“无瑕号”这样的危险事件进行深刻反思非常重要。北京需要控制危及水手和飞行员生命并违反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的海上行为。然而,华盛顿一直公开进行收集情报活动的政策也需要仔细审查。这些搜集情报活动的成果与其付出的政治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这其中包括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更为高涨。美国监测船和飞机在中国海岸的频繁出现,不仅不能为 21 世纪的全球和地区安全创造坚实的基础,反而提醒中国想起过去的“炮舰外交”所带来的耻辱。现在需要华盛顿方面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大胆的决定。

作为对这一实质性让步的回应,美国自然期望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虽然北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中国要符合全球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歼 20 战斗机的最近测试似乎破坏了 2010 年盖茨访华所达成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我们很清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夺取中国发展先进作战飞机的权利。但令人明显反感的是北京有着这样的武器发展项目却没提供基本的信息,如基本的计划、计划的目标及成本等。近期关于中国军事透明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缺乏官方信息激起对未来中国能力的推测和夸张的预测。”因为中国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领导层必须在这一问题对北京的声誉造成更大的损害之前优先考虑它,以免令人质疑其“和平发展”。透明度和监督之间的明确联系有助于打破目前军事关系的僵局,同时也服务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

### 搜 救

在 20 世纪,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海上搜

救方面练就了强硬的本领。相比较,尽管现在中国的文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变化,搜救活动中的各方利益也正在增加,但搜救还只是北京方面最近才优先考虑的事情。

1999年,中国人目睹了一个可怕的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海上灾难事件,大连—烟台之间的渡轮在白天烧毁并沉没,导致数以百计的乘客死亡。由于这场灾难发生在离中国海岸12海里内,所以使人们倍感屈辱和痛苦。自此以后,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海上搜救网络。现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外国水手从中国的海岸线上被救起。考虑到西太平洋上航线的繁忙与拥挤,这不仅仅对中国,而且对于整个国际航海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由中国海事服务所提供的这些搜救,表明情况越来越复杂。

中美海上搜救合作应该拓宽其范围,不仅是在地理上而且在服务方面。以前的合作主要包括每个国家各自的海岸警卫,以后还应扩展到包括中美两国的海军在内。中国船舶报告系统实现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络和中国类似系统之间的互通,在提升世界范围内的海上搜救效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自始以来中国海军就已经参与搜救工作,并持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正如舰载航空部队,尤其是直升机和远程巡逻飞机所体现出的一样。海军的搜救专业领域涉及潜艇救援。随着潜艇部队的迅速现代化,中国海军已经致力于潜艇救援能力的提升。2007年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访美时,就曾提出探讨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美国海军在潜艇搜救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定期与其他国家海军进行演习,如俄罗斯海军。实现潜艇搜救工作能力将标志着中美海军精英部队在信任构建方面的重要突破。值得指出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同中国海军在潜艇搜救领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 救 灾

救灾是中美之间海事合作的另一潜在的富有成果的领域。近期美国海事服务在印度尼西亚(2004)、墨西哥湾(2005)、海地(2009)的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美国海军在新的海洋战略《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中将救灾作为其核心任务。

中国军队从另一不同的角度进行人道主义救

济。历史地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参与了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武警力量的加强,更多地由武警关注内部安全,包括救灾工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更多地关注作战。然而,这一界限并不是非常固定。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不是武警,拥有最为精英的部队、最为专业的设备,如大型运输飞机,所以中国军队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初步证据表明,中国在处理一些海上人道主义救援上很有成效,比如应对常常袭击中国东南沿海的台风。

2010年9月中国发表的声明——中国军用直升机将为受水灾的巴基斯坦灾民提供援助,就是北京越来越愿意调派军事力量参加国际救灾的一个信号。2010年的重大发展,包括向亚丁湾派出的专门新建的医院船和新型071两栖登陆舰,也预示着中国海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新局面。这些船可以承载重型直升机,这对救灾行动非常关键;而新型071两栖登陆舰也能配置气垫登陆艇,这能有效地应对边远地区或设施被破坏港口的自船至岸上的后勤挑战。

在人道主义援助的竞争模式中,华盛顿和北京卷入“投标战争”。有人甚至指出,在中国开始积极地“表演”之前,这一“伟大的游戏”已经进行。但这样的进程将是破坏性的,甚至会有潜在的危险。比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就争相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但是这些物品往往与军事政治问题或者其战略利益相关联,所以几乎没能对国际发展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另一个方法是从早期阶段就优先考虑建构中美或多边框架,而拒绝接受零和战略目标。这一方法将节约资源,并允许各个国家发展与之相称的能力,尤其是通过使中美海军频繁地进行合作,以培养彼此之间更大的信任。

## 环境管理

在中国长时间的环境退化之后,环境管理现在对于北京的领导层而言成为真正“前沿和中心”的问题,这部分是缘于对环境退化将激起社会不满的忧虑。现在对于中国国家领导层而言,环境的风险和代价排在大部分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之前。美国对于其在19世纪环境治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非常满意,但是由于在经济快速现代化时期美国

的环境也遭受了破坏性的退化,所以非常同情中国的状况。2010年4月墨西哥湾灾难性的石油泄漏表明美国海洋环境管制和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在保护海洋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经历,面对共同的挑战,也分别承担着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全球海洋环境标准的重大责任。

中美在环境领域已经进行了一些规模虽小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合作。当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认为海洋正在面临着过度捕捞的严重危机时,这种合作发生在渔业管理的核心领域。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渔政指挥中心(FLEC)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为执行联合国禁止使用流网的禁令已经进行了密切合作。由于中国渔政指挥中心在太平洋中北部没有进行管制的远程巡逻艇,十多年来中国已采取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上搭乘“随船观察员(shiprider)这一不寻常的措施。这一共栖的合作创举需要推广,也要作为海洋环境管理合作中的案例进行研究(实际上这一案例在中国已经得到了认真的研究)。中国沿海和近海的捕鱼船队很大,这使中国渔民逐渐遵守有关可持续性的全球环境规范非常重要。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在2010年的石油泄漏之后,减少泄漏和补救问题就成为中美海事执法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2010年夏天中国发生大面积的石油泄漏同样不令人惊讶。中国海域的大量石油泄漏,在世界海洋上航行的大量中国油轮,在中国海域进行的钻井活动都说明这一领域进行积极合作的重要性。甚至在更高层次的合作上,每个国家的事合作也考虑开展“绿色海军”业务和设备的对话。另外,核动力潜艇提出了一个大多数国家海军不能面对的完全不同的环境挑战。

最后,有关气候变化的海事政策问题象征着对话与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在北极政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小的合作进步:2009年,中国科学家在极地地区踏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机检索数据。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能够而且应该做。比如,中美海事服务应该参与到关于在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方面怎样合作的持续争论中。

### 区域海事安全

海事安全是中美区域安全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当前,这样的合作看起来非常有限,很大程度

上局限于在华盛顿需要北京援助的特定案例中施加压力。然而,继2010年3月韩国军舰“天安号”的沉没和11月炮攻延坪岛之后,南北朝鲜海上边界争端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区域海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暴露无疑。令人遗憾的是,北京和华盛顿最近对彼此在黄海的活动提出了挑衅性的警告。相反,另一范式将强调华盛顿和北京在这一敏感地区的共同利益。最理想的是在这个动荡的局面(或者说在未来类似的情形)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和中国北海舰队司令相互沟通,彼此了解,不仅讨论朝鲜形势,而且指挥其下属就各种情景进行演习。如果双方指挥官同意,他们可以即时交换信息以制定一个共同行动图。

只要华盛顿和北京在预防或至少限制朝鲜半岛爆发突发事件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那么上述措施就有着非常显著的意义。目前这些措施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必须会在会跑之前学会走。海军领导人及其下属之间、海军教育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持续对话,将会为他们交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的看法提供合适的环境。很清楚,如果朝鲜海岸发生战争,中美海军舰队将彼此接近。至少,避免误会和误解是必要的,在朝鲜沿海这一复杂的、封闭的、潜在的“热点”地区,一旦发生战事,将非常危险。然而,在未来的朝鲜半岛,尽管存在一些相反的言论,但考虑到北京和华盛顿在避免遏制突发事件方面有着巨大的利益,两国海军渴望更密切的配合。

东南亚地区也提供了区域海事合作的大量机会。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倡议,是联手遏制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地方海事冲突。比如,在最近几年里,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偶尔也出现紧张局势。2006年,除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海事安全局的合作之外,实际上还形成了一种不同类型的中美海事合作。为了符合马六甲海峡两岸国家通过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要求,已经开展水文调查,导航设备也有所改进,因此在提升这个关键航道的安全方面双边都作出了努力。除了加强海事安全外,这种共同行动不仅能够加深中美之间的信任,而且使地区国家相信大国将合作维持国际安全而不是为了增强影响力进行危险的竞争。有理由相信,东南亚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并不希望被迫在大国之间进行选择:比如,2010年8月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尔伯特·罗慕洛就宣称不需要美国帮助解决与中国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

海地区的边界争端。这一评论显然是针对 2010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所发表演讲的回应。她在演讲中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着关乎航海自由的国家利益,反对任何相关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一言论被视为中美安全关系的严重后退。因此,中美区域海事安全合作的新范式在见证了利益相关方日益紧张关系的地区得到了好评。

### 海上通道安全

中国在亚丁湾为打击海盗所作的努力充分证明,北京倾向于以一种负责任而不是威胁的方式来发展其海权。面对重要海上通道所通过的国际轮船所受到的严重威胁,中国承诺在东部非洲维持一个舰队这一举动清楚地表明北京将承担一些维护国际安全的积极的新姿态。根据 2009 年 11 月访问中国护卫舰的一名美国海军少将史葛·桑德斯所言:“很清楚,中国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我们的努力是互惠的。”就在同一个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指挥员、海军少将王志国同欧盟海军部队指挥官彼得·宾特一起对荷兰海军“埃沃特森”号进行访问。这一有趣的事件表明,许多欧洲的海上大国,加上作为整体的欧盟,在帮助促进形成全球海上安全更稳定的结构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北京更为信任没有密切参与东亚安全的欧洲力量,这毫无疑问。正因如此,欧洲力量可能成为促进更具建设性的中美海事关系的重要桥梁,正如欧盟在亚丁湾所做的那样。

虽然在某些方面中国海军及其安全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中国打击海盗的努力是不具威胁性的。这有如下一些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派往这些地区的部队规模很小,且能力有限。尽管有关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有很多炒作,但中国舰艇和油轮没有对当地任何国家造成威胁,比印度或美国海军少得多。其次,派出部队的行动相当克制和谨慎。最后,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新使命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中国海军,而是来自民间的海事部门。因此,尽管未来中国可能改变这一立场,但国际社会可以完全放心地将中国的首次海外访问视为温和的、克制的,主要是受商业而非地缘政治动机驱动。所以,2008 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迅速对中国再次打击海盗的努力表示欢迎,就毫不奇怪了。

毫无疑问,海上通道安全是中美海军能够找

到充足的共同利益的领域。美国大胆而成功地打击海盗,这得到中国海军的钦佩。中国海军人员中对美国海军经验和敬业精神的广泛崇敬是华盛顿应该利用的有利动力。双方海军对这一联合任务的热情可以将中国密切关心且讨论已久的“马六甲困境”从原来中美安全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动力。

### 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尽管到目前为止得到的绝大多数证据都支持对中国国际行为的发展作出良性的解释,但为应付最坏的情况,很显然也需要武装部队。尽管双方都努力想实现合作,但如果将来竞争加速,甚至导致武装冲突会怎样呢?美国军方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军方,或者至少美国海军,正保持一种“避险”的能力,这可以在潜艇部队中找到迹象。相比较削减 DDX 驱逐舰项目之后面临一个不确定未来的水面部队结构而言,美国海军通过受到广泛赞誉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是美国海军下一代主力攻击型核潜艇)计划已达到控制成本的目标。锁定在接下来以每年建设两个新的潜艇的速度,可能是国会能够递交有关保持华盛顿在全球海军发展中的强势地位的新决定的最为重要的信号。中国战略家确实对于美国的潜艇能力非常看重,毫不奇怪,他们对美国潜艇部队的发展有浓厚的兴趣。由于海军总支出不可能增加,考虑到新的潜艇的费用,只能通过减少航空母舰(和水面护航)的数量来获得所需的成本。“避险”是一个更有效和谨慎的做法。没有必要对中国采取空一海作战策略。如果华盛顿决心捍卫在第一岛链中各方争议者对华所主张的每一个岛礁,那样一个强硬的、鲁莽的立场可能是必要的,但不管是美国的经济还是美国的纳税者都不可能接受如此不明智的做法。相反,2010 年 7 月美国潜艇部队在亚太地区同时派出载有巡航导弹的潜艇,传递了一个更微妙的信息。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表明了新的威慑能力,但重要的是,这一力量的展示并不发生在中国的近海领域,所以不致过度威胁北京。中国的报道表明这一“信息”并不是没有被注意,尽管反应相对低调。鉴于新技术的发展,实现对东亚地区的“海上控制”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一传统的策略必须屈服于相对

简单的“海上阻绝”任务。这最终将比缺乏可信度的“海上控制”策略更有威慑价值。

当前美国国防政策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威胁，并因此重新得到关注。然而美国对这一假想的威胁所采取的行动，比如与亚太地区的传统伙伴继续保持联盟关系，实际上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美国安全规划者可能会考虑北约，他们的中国同行则会想到1900年攻破北京城墙的八国联军。这种不断高涨的威胁感的结果将是未来几十年后一名中国军人同时对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一些小国家。北京这样大规模发展的前景今天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如果目前的增长轨迹保持稳定的话，就不再奇怪了。中国的战略家已经呼吁大幅增加中国国防预算，这对全球安全将具有潜在的消极影响。

在这一点上寻求建立“亚洲版的‘北约’”是非常草率的。从定义上来看，美国国防战略的重点不是真正地想“避险”，而是应该努力减少一个不确定世界里的风险。美国国防政策应该主要优先发展与北京的安全合作。

## 结 语

自从中美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那时，一个刚刚从国内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选择同经验丰富、设备齐全的美国军队进行那场战争，令人非常惊讶。从朝鲜战争的悲剧中，华盛顿和北京都必须吸取教训，即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允许因误解、意识形态或各自的国情导致两个大国陷入冲突，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非中美双方都同意进行系统的军事接触，

否则双方在军事关系方面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军事接触应该是全面的、深入的，首先要考虑的是近几年来局势比较紧张的海事领域。中国安全政策发展的两大重点促使近期的发展。一是中国已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证明其承担维护全球安全的责任。二是以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为特征的两岸关系中的积极气氛，应为在这一微妙的问题上采取一些建设性的行动提供足够的动力。真正的进展可能确实需要双方痛苦的政策调整。对华盛顿来说，对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更著名的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的立法改革（或至少是重新解释）可能是与中国发展实质性军事关系要付出的代价。北京面临的挑战同样是艰巨的，因为中国领导人需要在民族主义已成为现行制度政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支柱的情况下，对其民族主义倾向的政策进行调整，转向积极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这一做法在当今中国并不特别受欢迎。北京有意妥协的话，更具体的措施是努力提高军事透明度。时至今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如果中国想建立确保其和平崛起所必需的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之，为建立稳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需要太平洋两岸的双方都作出妥协。

中美两国的海上利益要求双方在危机沟通、搜救、救灾、环境管理、区域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六大领域进行密切合作。这些问题将为海洋安全合作奠定基础。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海洋方面出现一些紧张局势也是自然的，但如果双方不能发展军事信任和合作，则会招致灾难。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责任编辑:文心]